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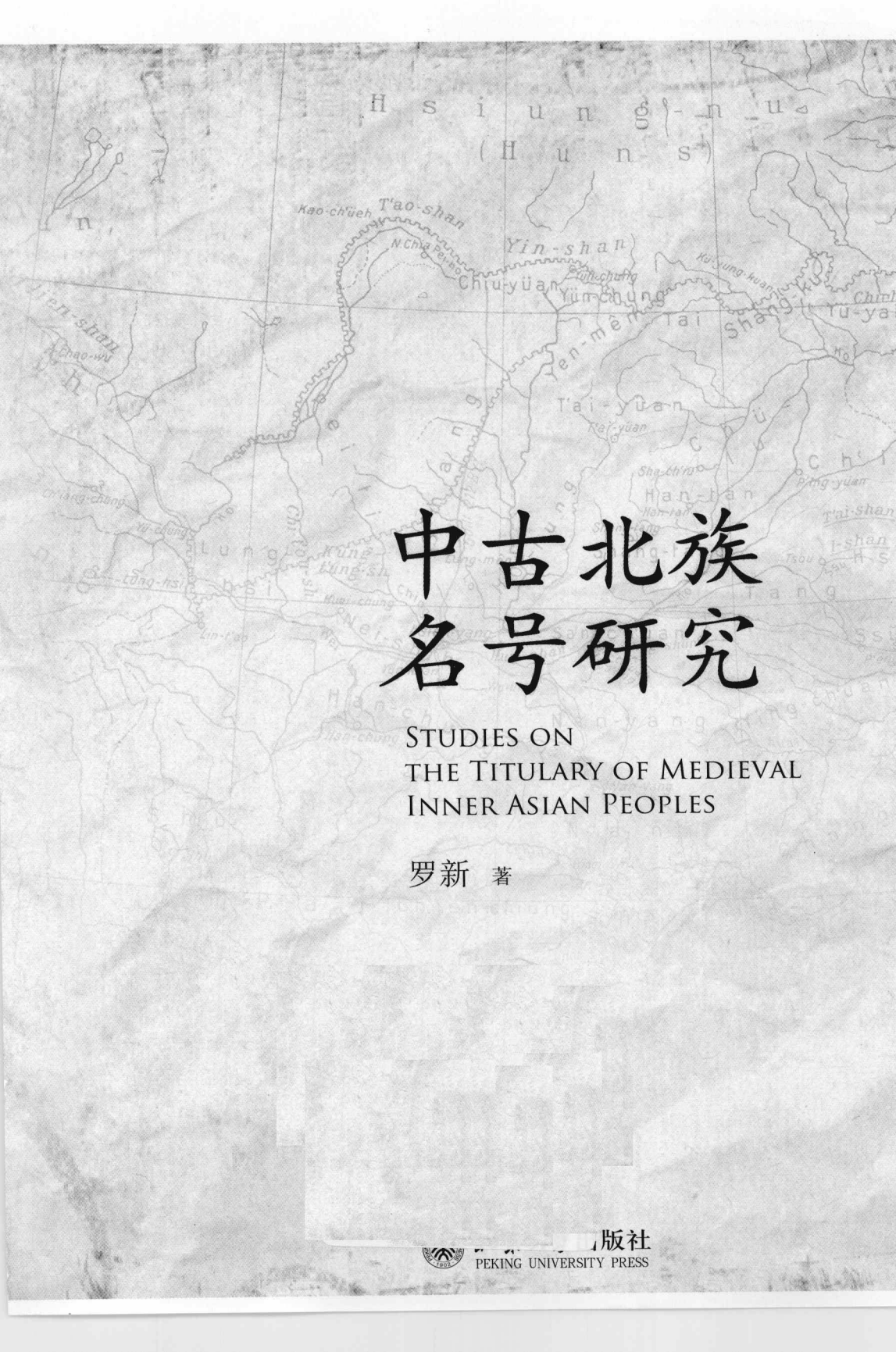
中古北族 名号研究

STUDIES ON
THE TITULARY OF MEDIEVAL
INNER ASIAN PEOPLES

罗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古北族 名号研究

STUDIES ON
THE TITULARY OF MEDIEVAL
INNER ASIAN PEOPLES

罗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古北族名号研究/罗新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7-301-14985-0

I. 中… II. 罗… III. 古代民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国-中古
IV.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9290 号

书 名: 中古北族名号研究

著作责任者: 罗 新 著

责任编辑: 刘 方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4985-0/K · 058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20.25 印张 270 千字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前言

惶恐地呈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是我近年来在中国中古史与内亚(Inner Asia)史的交叉领域一点学习心得的小结。书以《中古北族名号研究》为名,“中古”是中国史分期的一般用法中的中古(medieval)阶段,主要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北族”即所谓北方民族,主要是阿尔泰语系诸民族(Altaic peoples);“名号”则主要指政治名号(political titulary),以及从政治名号衍生出来的其他专名(proper names),如人名、地名和族名,等等。专名及政治制度是北族史研究者历来关注的问题,但过去的研究分属于并往往各自局限于历史比较语言学(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语文学(philology)和历史学等几个不同的领域。我的兴趣和目标都是历史学,但我愿尽力跨越这几个领域之间的围墙,了解和学习其他领域、特别是所谓阿尔泰学(Altaic Studies)的成绩,把中国中古史有关北族的史料,置于内亚史(Inner Asian history)的背景上重新认识。本书所致力分析的北族政治名号,就是在这样的观察之下才显现出自己的研究价值。

我相信,一切出现在历史视野里的所谓民族,都是政治体(polity),都是以政治关系和政治权力为纽带构建起来的社会团体,尽管这种团

体总是要把自己打扮成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紧密联系的社会群体。进入历史学研究范畴的北方民族,都是一个又一个的政治集团,而不是通常理解的一个又一个在“种族”意义上彼此区别的“族群”。只有把所谓民族理解为政治体,我们才不至于深陷在古代史料所布下的有关起源和迁徙的迷魂阵里难以自拔,才有可能填平民族史与一般史之间的鸿沟。为真正说明这一理解对于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意义,需要在许多方面做工作。以中古北族的政治名号为对象所进行的这些专项分析,只是我们的尝试之一。

本书的基本方法是对中古北族的政治名号进行结构与功能的分析。一个完整的北族政治名号通常由两个部分组成,比如毗伽可汗(Bilgä Khagan),“可汗”无疑是一个制度化了的政治职务,“毗伽”则是一个修饰性的美称。我们把职务部分称为“官称”(title),把修饰性的美称部分称为“官号”(appellation)。任何获得一个政治职务(官称)的人,都会同时获得只从属于他个人的、与官称一起使用的官号。政治名号=官号+官称。官号使官称的获得者具备了唯一性,因而官号就具有与“姓名”一样的标志个人身份的功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通常是名号中的官号而不是官称代替政治人物的原有名字(或前一个政治名号)成为他的新身份标志。其中一些领袖人物的官号(或官号的一部分)逐渐变成他所领导的政治体(部族)的名称,即史籍中的族名。同样的道理,这些政治名号还会沉淀在地名等其他专名上。因此,对这类名号的研究就可以使中古北族史原本十分有限的史料得到拓展。

《北史》解释柔然官制中的官号传统说:“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为称号,若中国立谥。既死之后,不复追称。”《通典》也有一段有关突厥名号的重要记录:“其初,国贵贱官号凡有十等,或以形体,或以老少,或以颜色、须发,或以酒肉,或以兽名。”与柔然的官号致力于表达官员个人的“行能”相同,突厥官号也是为了反映官员个人的形貌或气质特征,具有本质上的个别性、独一性。虽然柔然和突厥汗国已经进入高级形态的政治发育水平,这种描述并不那么恰切。《魏书》记道

武帝建国时期的制度特征,有一段过去没有被准确理解的话:“初,帝欲法古纯质,每于制定官号,多不依周汉旧名,或取诸身,或取诸物,或以民事,皆拟远古云鸟之意。诸曹走使谓之鳧鸭,取飞之迅疾;以伺察者为候官,谓之白鹭,取其延颈远望。自余之官,义皆类此,咸有比况。”其实这并不是道武帝时期拓跋制度的特有情形,而是拓跋鲜卑以及其他北族共有的古老传统。“或取诸身,或取诸物,或以民事”,即柔然之所谓“行能”,也即突厥之“或以形体,或以老少,或以颜色、须发,或以酒肉,或以兽名”。这些出自华夏人士的观察和叙述,虽然未能精确传达中古北族制度传统的基本精神,但毕竟突出了北族制度中那些明显不同于汉魏制度的地方,对于我们理解中古北族的官号、官称的传统,是有很大帮助的。

官号与官称都源自于早期政治组织(较低级政治体)的名号,这种名号是真正表述和标志个人“行能”的称号,“或以形体,或以老少,或以颜色、须发,或以酒肉,或以兽名”,完全依据个人的人格特征、形貌特征或功德经历,只与个人相关。原始政治体的政治性称号是繁杂丰富的,每一个政治人物都有专属于他个人的称号。随着政治体的发育(主要体现为规模的扩大和层级管理的复杂),其中一些称号会凝固下来成为制度化的官称,而配合官称使用却仍然保持早先的“专属”性质的,则是官号。当然,被反复使用的官号也会有一部分凝固下来变成官称,而已经成为官称的名号也有可能保留其美称性质在某些场合被用作官号。无论如何,官称相对来说数量较少并且较为稳定,而官号则数量较大而且很不稳定。早期官号较为单一的情况也会随着政治体的发育变得越来越复杂,一个官称可能会与一组复杂的官号配合使用,但可能出于实际使用中的方便简洁的要求,事实上一组复杂的官号中只有其中某一部分会具备身份标志的功能。例如,根据噉欲谷碑,噉欲谷的名号全称是 Bilgä Tonyuquq Boyla Bagha Tarqan(毗伽噉欲谷裴罗莫贺达干),其中达干是官称,其余都是官号。但从碑文来看,只有 Bilgä Tonyuquq 是噉欲谷用以自称的名字,而在汉文史料中,更是只有“噉欲

谷”发挥着人名的功能。一长串复杂的官号中,被凝固下来成为标志性符号的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正是运用这样的名号分析方法,本书各部分的写作才可能进行。但仅有这一方法还是不够的,尽可能地了解和学习的国际阿尔泰学的相关成绩是本书的另一个基础。提到这一点我首先要感谢土耳其学者涂逸珊(İsenbike Togan)教授。她于2004—2005学年来北大访问,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持了“古突厥文噶欲谷碑研读班”。在她的鼓励和具体指导下,我开始学习土耳其文和古突厥文,而且还在2007年到她执教的中东技术大学(Orta Doğu Teknik Üniversitesi)讲授“Inner Asia and China”课程,更进一步学习了突厥史。这些学习给了我粗浅涉猎国际阿尔泰学所必需的信心和勇气,其结果则是大大扩展了自己的知识面。当然直到现在我对于阿尔泰学也谈不上入门,也许将来我也无法达到入门的水平,但是哪怕是十分粗浅的涉猎也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虽然我自己并不真懂的阿尔泰学充满敬意,但就中古北族史的研究来说,我很想强调对汉文史料进行深入解读的重要。古代内亚史最重要的史料就是汉文史料,而掌握汉文史料并不是那么轻易的事情,即使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来说也是如此。无论是在国际突厥学界,还是在国际突厥史学界,尽管汉文史料的重要性从来没有人否认过,但研究中的确存在着更依赖古突厥文碑铭的倾向。出现这种倾向固然有学科属性的内因,但也与汉文史料的难以掌握有关,或许以护雅夫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在这一领域能够取得卓越成绩,可以从这一角度部分地得到解释。中国学者如果不能发挥在掌握和解读汉文史料方面的天然优势,那么我们在这个领域就难以做出真正的成绩。我自己是学习魏晋南北朝史的,本书虽然涉及汉唐,但重点还是魏晋北朝。而我能够较多地使用魏晋南北朝史料,全拜近二十年来田余庆先生和祝总斌先生两位恩师的教诲。特别是田余庆先生十多年前开始思考北魏早期历史(其成果就是2003年出版的《拓跋史探》),我有机会观摩他的研究过

程,这对于我重新思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族问题及相关史料,是一个巨大的促进和提高。

我开始关注中古北族问题以来,得到很多师友的指点和鼓励,其中王小甫、吴玉贵、荣新江、刘浦江、罗丰、张帆等,更是我经常请益求助的对象。本书各章基本上都曾经以论文形式单独发表,在论文的构思、写作和修改中,他们都提出过宝贵的批评意见。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古史方向的研究生有很多都是我这些篇章最早的读者和批评者,他们的批评对我的意义之大恐怕他们自己是不太了解的。显然在这里尽数罗列那些对本书写作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的姓名,是容易造成这篇“前言”布局失衡、尾大不掉的,因此我把感谢的话埋在心里。当然我知道,我这本小书并不足以答谢他们对我的帮助,所以我宁愿给出远在未来的承诺,但愿今后的工作配得上那些温暖的友谊和快乐的时光。

目 录

前 言/1

可汗号之性质

- 兼论早期政治组织制度形式的演化/1
- 一、北亚草原部族政治文化中的可汗号传统/5
- 二、可汗号的起源、功能、形式与性质/12
- 三、从所谓“生称谥”看古代中国的名号分化问题/21

匈奴单于号研究/27

- 一、西汉匈奴的单于号问题/29
- 二、南匈奴单于世次与单于号之关系/36
- 三、南匈奴单于号的获得时间及相关问题/43

论拓跋鲜卑之得名/49

- 一、拓跋语源的检讨/50
- 二、魏晋时期鲜卑各部的部族名号/60
- 三、部族得名与部族政治体的发育/72

2 中古北族名号研究

北魏直勤考/80

- 一、正史及石刻史料中所见的北魏直勤/81
- 二、直勤与内亚游牧社会部落传统之关系/88
- 三、从直勤制度看拓跋部族社会的汉化/97

虞弘墓志所见的柔然官制/108

- 一、莫贺去汾/111
 - 二、达官/115
 - 三、莫贺弗/119
 - 四、莫缘/123
- 余论:柔然官制研究的阿尔泰学意义/127

柔然官制续考/133

- 一、俟力发/136
 - 二、吐豆发/141
 - 三、俟斤/146
- 余论:突厥对柔然职官体系的改造/150

高昌文书中的柔然政治名号/155

北魏太武帝的鲜卑本名/166

高句丽兄系官职的内亚渊源/175

- 一、高句丽兄系官职的渊源与传承/176
 - 二、加(兄)名号语源的内亚渊源/183
 - 三、拓跋鲜卑及其他内亚民族以 aka/akan 为官称的情况/188
- 小结/192

论阙特勤之阙/194

- 一、阙特勤之阙的语源问题/196
- 二、隋唐时期的俱卢与处罗/202
- 三、前突厥时代 kul 名号在内亚的应用/207

再说噉欲谷其人/213

一、噉欲谷是一组官号/214

二、吐谷浑即噉欲谷/218

三、噉欲谷不是阿史德元珍/221

从可汗号到皇帝尊号/225

附 录

一 始建国二年诏书册与新莽分立匈奴十五单于/238

二 跋前秦梁阿广墓志/245

三 北魏孝文帝吊比干碑的立碑时间/253

四 松下宪一《北魏胡族体制论》评介/259

五 评涂逸珊等《汉文突厥史料之〈旧唐书·突厥传〉》/268

参考文献/275

索 引/304

可汗号之性质

——兼论早期政治组织制度形式的演化

据杜佑《通典》，北亚草原游牧部族中，首先以可汗作为政体最高首领称号的，是柔然的社柰，所谓“社柰始号可汗，犹言皇帝”^①，又称“可汗之号始于此”^②。胡三省也说：“可汗，北方之尊称，犹汉时之单于也。”^③但是胡三省注意到“拓跋氏之先，《通鉴》皆书可汗，又在社柰之前”^④。《资治通鉴》叙拓跋鲜卑先世，从可汗毛到可汗力微之间，还提到可汗推寅、可汗邻^⑤，显然以可汗为拓跋鲜卑首首之称号，即胡三省所谓“此时鲜卑君长已有可汗之称”^⑥。然而魏收《魏书》中，全然没有这方面的痕迹。这可能是因为孝文帝改革以后，北魏前期的历史资料曾经被大幅度地修订过，故有关史实不得见于《魏书》。著名的嘎

① 杜佑：《通典》卷一九四，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88年，第5301页。

② 杜佑：《通典》卷一九六，第5378页。

③ 《资治通鉴》卷七七胡注，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年，第2459页。

④ 《资治通鉴》卷一一二胡注，第3534页。

⑤ 分别见《资治通鉴》卷七七第2459页、卷八〇第2548页。

⑥ 《资治通鉴》卷八〇胡注，第2548页。

2 中古北族名号研究

仙洞石壁祝文有“皇祖先可寒”、“皇妣先可敦”，即不见于《魏书》^①。北魏奚智墓志称“始与大魏同先，仆脰可汗之后裔”，罗振玉认为“仆脰可汗”即《魏书》卷一《序纪》所记献帝隣之父威皇帝佗。^②可见《资治通鉴》记拓跋先世君长为可汗，必有所本。《旧唐书》记“后魏乐府始有北歌，即《魏史》所谓《真人代歌》是也。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目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浑》、《部落稽》、《巨鹿公主》、《白净王太子》、《企喻》也。其不可解者，咸多可汗之辞。按今大角，此即后魏世所谓《簸逻回》者是也，其曲亦多可汗之辞。北虏之俗，皆呼主为可汗。吐谷浑又慕容别种，知此歌是燕魏之际鲜卑歌”^③。《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记北魏乐府的“北歌”曲目有《慕容可汗》等，此外还有许多北歌，“其不可解者，咸多‘可汗’之辞”^④。田余庆先生说这些北歌“可以确认为魏世之作”^⑤。《宋书》卷九六《鲜卑吐谷浑传》记慕容鲜卑乙那楼对吐谷浑言“处可寒”，并解释云“宋言尔官家也”^⑥。可寒即可汗^⑦。《晋书》记载魏晋之际陇西鲜卑的乞干被部众推为“统主，号之曰乞伏可汗托铎莫何”^⑧。可见可汗(Khan、Kagan、Qaghan)一词，虽然从语源(Etymology)上看可能并非阿尔泰语系(Altaic)原生词汇^⑨，但至少在鲜

① 米文平：《鲜卑石室寻访记》，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第55页。

② 罗振玉：《丙寅稿》，《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第一册，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69年，第185—186页。

③ 《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二》，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1071—1072页。

④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五，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63页。

⑤ 田余庆：《拓跋史探》，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219页。

⑥ 《宋书》卷九六《鲜卑吐谷浑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2369页。

⑦ 《北史》卷九六《吐谷浑传》载此事与《宋书》略同，可寒即可汗。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3178页。

⑧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国仁载记》，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3113页。

⑨ Peter B. Golde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 Ethnogenesis and State-Formation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Verlag, 1992, p. 71.

卑语中早已存在^①,可汗并非始见于柔然^②。

然而,吐谷浑时期的慕容鲜卑和力微以前的拓跋鲜卑,其政治体(polities)都处于较低级别的发展阶段,尚未进入原始国家(primitive states),甚至还只是处于酋邦(chiefdoms)的早期或初始阶段。而柔然社峇称可汗,是与北魏天子相对抗的一种政治形态,其政治体已经具备早期国家的基本特征。因此,依据现存史料,认为可汗作为原始国家或酋邦这一级政体(supratribal polities)的首脑(supreme ruler)的称谓,最早见于柔然,也是可以成立的。朱熹断言“《木兰诗》只似唐人作,其间‘可汗’、‘可汗’,前此未有”^③。即使《木兰诗》作于唐代的可能性较大^④,但以可汗称谓作为证据,显然是不对的,因为北朝代人社会的音乐及故事中与可汗相关者甚多,已如前述。无论可汗一词最早出现于哪一部族、哪一语言^⑤,在柔然之后,经嚧哒、吐谷浑,特别是突厥等民族的传布,作为高级政治体首脑取代匈奴单于的可汗称谓,遂广泛流行于内亚各语言、各族群的政治体中^⑥。

文献上最早以可汗为高级政治体元首称谓的柔然君主社峇,据《北史》卷九八《蠕蠕传》,“自号豆代可汗。豆代,犹魏言驾驭开张也;可汗,犹魏言皇帝也”^⑦。今本《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补自《北史》,可是豆代作丘豆伐^⑧,与《通典》同^⑨。很可能《北史》传写中出现了夺

① 町田隆吉:《北魏太平真君四年拓跋焘石刻祝文をめぐって—“可寒”・“可敦”の稱号を中心として》载《アジア諸民族における社会と文化—岡本敬二先生退官記念論集》,東京:国書刊行会,1984年,第88—114页。

② 陈发源:《柔然君名可汗考》,《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第107—110页。

③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四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328页。

④ 唐长孺:《〈木兰诗〉补证》,《江汉论坛》1986年第9期,第41—44页。

⑤ 李志敏:《可汗名号语源问题考辨》,《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第47—55页。

⑥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上编,收入白鸟库吉《塞外民族史研究》上册,东京:岩波书店,1986年;兹据中译本,方壮猷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64—72页。

⑦ 《北史》卷九八《蠕蠕传》,第3251页。

⑧ 《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2291页。

⑨ 《通典》卷一九六,第5378页。

讹。《资治通鉴》系其事于晋安帝元兴元年,即北魏道武帝天兴五年(402)。既然可汗称谓意犹华夏的皇帝,社崆自称可汗已成至尊,为什么还要在可汗前面加上“丘豆伐”的修饰词呢?《北史》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解释:“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为称号,若中国立谥。既死之后,不复追称。”^①这段话的意思是,柔然“君及大臣”在职务称号之前另有修饰性称号,以表其行能,性质类似于华夏帝王贵族死后立谥,不同的是华夏立谥在死后,而柔然加号在生前,死后则没有类似活动,所谓“既死之后,不复追称”。这是对柔然乃至其他内亚民族(*Inner Asian Peoples*)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的观察和理解。如果我们把可汗作为游牧政治体元首职务的称号(*Title for the official position*),即一种“官称”,那么每一个可汗都有的这种修饰性称号,即本文所谓的“可汗号”(*Appellation for the title of Qaghan*),便就是官号(*Appellation for the official title*)之一种。丘豆伐即社崆的可汗号。

本文通过考察古代北方各部族的可汗号传统,论证作为官号的可汗号与作为官称的可汗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并尝试分析可汗号的起源、结构及功能,由此探索早期政治组织的制度形式,使北方部族可汗号的性质、功能及历史特性得以昭显,并联系华夏社会早期的所谓“生称谥”纷争,发挥可汗号及官号研究的民族志和人类学思想素材的作用,反观华夏历史早期的制度分化问题。在可汗之前作为北方草原最高政治体首领重要官称的“单于”称号,当然同样存在“单于号”。单于号与可汗号一样,都是内亚政治传统中的官号(*Appellation*)。由于两汉史料较少,认识单于号需要借重于对可汗号的研究。单于号问题只有在可汗号被认识清楚之后,才能被纳入到同一个思路中予以解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首先要讨论时间上较晚的可汗号而不是单于号。

① 《北史》卷九八《蠕蠕传》,第3251页。

一、北亚草原部族政治文化中的可汗号传统

考察古代北方部族的可汗制度,可以发现所有的可汗都有可汗号,可汗与可汗号不可分离。从柔然到高车到突厥,从吐谷浑到铁勒诸部到契丹,都没有例外。试分述如下。

从社崆到阿那瑰,柔然共有十三位可汗,其中只有第三任可汗步鹿真即位不久为大檀所杀,其可汗号未曾传写下来,其他十二个可汗都有可汗号。兹据《北史》卷九八《蠕蠕传》,分别列此十二可汗之名及其可汗号如下:一,社崆,号豆代(丘豆伐)可汗;二,斛律,号蔼苦盖可汗;三,大檀,号牟汗纥升盖可汗^①;四,吴提,号敕连可汗;五,吐贺真,号处可汗;六,予成,号受罗部真可汗;七,豆崆,号伏古敦可汗;八,那盖,号候其伏代库者可汗;九,伏图,号他汗可汗;十,丑奴,号豆罗伏拔豆伐可汗;十一,婆罗门,号弥偶可社句可汗;十二,阿那瑰,号敕连头兵伐可汗。阿那瑰之后,柔然可汗还有铁伐、登住、库提等人,但国势衰残,典章涣散,早已不为北朝君臣看重,其可汗号亦无由载录^②。《北史》在记录可汗号的时候,还解释了这些美称的意义,比如丘豆伐意为“驾驭开张”,蔼苦盖意为“资质美好”,牟汗纥升盖意为“制胜”,等等^③。

政治文化深受柔然影响的突厥,也保持着在可汗称谓前附加可汗号的传统。综合《周书》卷五〇《异域·突厥传》、《隋书》卷八四《北狄·突厥传》、《北史》卷九八《突厥传》、《通典》卷一九七至一九九突厥条和《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传》,可以知道突厥历任可汗中,除了

① 大檀的可汗号,在隋代《郁久闾伏仁墓志》中作莫洛纥盖可汗。见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图版第五九九号。

② 关于柔然可汗家族世系传承,可参看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一书卷末所附《柔然世系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③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下编,第71—82页;周伟洲:《敕勒与柔然》,第154—157页。

6 中古北族名号研究

个别因资料残缺外,绝大多数都在即可汗位后得到一个可汗号。突厥第一个称可汗的是土门,他自号伊利可汗,号其妻为可贺敦,这是在政治上不复臣服柔然的明确表示,采用的手段则是在政治体制上学习柔然,以可汗为突厥政体的最高首脑。土门死,子科罗立,号乙息记可汗,又译作阿逸可汗^①。科罗死,弟俟斤立,号木杆可汗。俟斤死,弟某为他钵可汗。他钵可汗死,科罗子摄图立,号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简作始波罗可汗(*Işbara Qakhan*),隋译沙钵略可汗,可视为一种异译^②。沙钵略死,弟处罗侯立,号叶护可汗。处罗侯死,沙钵略子雍虞闾立,号颉伽施多那都蓝可汗。等等不赘。东突厥(北突厥)如此,西突厥亦如此。岑仲勉先生考证室点密即四(肆)叶护可汗,室点密是名,肆叶护是可汗号^③。室点密之子玷厥号达头可汗,泥利可汗子达漫号泥撅处罗可汗,其他不赘^④。

与柔然不同的是,突厥政体中往往多个可汗并立,其中只有一个可汗是最高首脑,是为大可汗,其他可汗分据方面,是为小可汗。突厥的多汗制,有学者认为源自高车的大、小可汗并立制^⑤。比如他钵可汗时期,他钵自然是大可汗,他立摄图为尔伏可汗,又以褥但可汗为步离可

① 《北史》卷九八《突厥传》对突厥先世有几种不同的记载,一种记伊利可汗死后,“弟阿逸可汗立”;另一种又说:“土门死,子科罗立,科罗号乙息记可汗。”见第3285—3287页。无论与土门是兄弟关系还是父子关系,阿逸即乙息记,同音异译,是没有问题的。这种一号两译的情况,反映了《北史》在编写突厥先世历史时使用了来源不同的材料,所以对突厥起源竟有三种绝不相同的说法。

② 《隋书》卷八四《北狄·突厥传》记录了沙钵略与隋文帝的往来书信,沙钵略信中自称“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隋文帝复信中称对方为“伊利俱卢设莫何沙钵略可汗”,可见始波罗即沙钵略之异写,区别在于前者用嘉字,后者则含有贬义。见《隋书》,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第1868页。《通典》卷一九七:“其勇健者谓之始波罗。”沙钵略即始波罗同音异译,又译作沙钵罗,车鼻可汗时期有沙钵罗特勤,西突厥有沙钵罗啞利失可汗,皆以勇健为美称。

③ 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16—119页。

④ 沙畹(*Edouard Chavannes*):《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中译本,冯承钧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4页;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第120—129页。

⑤ 薛宗正:《突厥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88—89页。